

贾樟柯：导演将会分为经历过新冠和没有经历过的

疫情期间的的生活：住在老家村里，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变成了半个农业人。

得知上海国际电影节“复工”的好消息，贾樟柯终于走出自己住

了三个多月的“贾家庄”。三个月里，我们见过他手摇爆米花、锄草、种田的照片，感慨着电影人向农业人的转变。

回到农村生活让贾樟柯对中国社会有了新理解：“中国这个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多韧劲，跟我们有广阔的农村有关。”老家安静的环境也给了他难得可以沉下心来创作的条件——看看他的成果，你会发现其实贾科长非常勤快——疫情期间不仅写了7万多字的文章、制作了12讲普及电影的有声读物，还写了两个剧本，拍摄了一部有关疫情的短片《来访》。到了疫情后半程，又在为全国100多万从业人员的电影产业复工复产呼吁。

2003年，贾樟柯亲身经历了非典疫情。“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有条件即兴随时拍电影了，但是当时什么都没有拍。多少年之后我再回忆非典，（印象）真的很模糊了——当你真的从事创作，你会发现记忆是很不牢靠的。笼统的东西都知道，但是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我们所呈现的就是细节，要通过细节来让人感知一个事件或者一个生活的形态跟氛围。所以到今年年初新冠疫情暴发的时候不由得让我反思了过去，我们为什么没有即兴地同步面对人类，对席卷人类的这样一个巨大灾难作出电影的反映？”

恰逢希腊塞萨洛尼基电影节邀请全球知名导演每人拍摄3分钟关于新冠疫情的短片，贾樟柯马上参与了进来。疫情对他来说，最直观的感受是“你不能外出了，有更多的封闭感”。他将这种感受拍成了《来访》：“就在我的办公室取景，我跟摄影师还有

两个演员，我们四个人就把这个片子完成了，在极限的情况下拍了一天，用一台手机来拍——《来访》整个影片3分多钟，它的结构里面一种新的、因为疫情带来的人的社交方法的改变。这种社交方法的改变带来了我们对于失去的或者已有的或者常态下生活的怀念。这个怀念的高潮：我演了我跟我的好朋友、平遥电影展的CEO，两个人坐在屋子里看电影。看的是2015年的电影《山河故人》片断，人山人海的场景。”他希望未来的生活可以恢复常态：“我们重新回到电影院，重新肩并肩坐在一起，这是人类最美的姿态。”

长远来看，疫情对电影界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贾樟柯觉得影响非常大：“过去我们学习电影史，有一句话，是电影界的一个共识——把导演分为经历过二战的和没有经历过二战的。带着战争的记忆从事电影，跟我们没有战争记忆的人有什么区别？是有区别的。他们对在极端条件下所呈现出来的人性是有感悟、有体察的，他们见证过人性最艰难、人性最黑暗的一个浩劫，所以他们对于理解人，以及由此散发出来的同情心，对于人和人的爱、对于整个人文价值是有巨大的塑造。新冠疫情是一样的——它在极度全球化的背景里面突然出现了，中断了人类正常的秩序，国际线封闭。过去我们小的时候旅行很不方便，一是因为经济条件，一是不允许你有那么自由的旅行；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融入到世界以后，旅行对大多数人是很方便的——世界各地都是我们中国的游客，中国到处是国外的游客，人类的这种实地互换、这种交流是很日常的。突然，国